

论美国华裔唐人街童年叙事的文化身份建构

谈凤霞

〔摘要〕 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建构是美国华裔儿童文学的核心主旨,“唐人街”这一族群文化空间在文学中发挥儿童族裔身份“孵化器”的重要作用。林语堂、赵健秀、叶祥添等华人作家的唐人街童年叙事从儿童视角出发,对边缘夹缝地带、家庭代际关系和故事隐喻空间中交织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揭示。他们对族裔文化根系进行发掘、发扬甚至重构性的“发明”,在流散空间中扮演了文化转译或重塑的角色,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品格的魅力。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们建构文化身份的不同立场、途径和旨归,为边缘族群在文化夹缝中建立文化自信和主体自洽提供了多种镜鉴。

〔关键词〕 美国华裔;唐人街;童年叙事;寻根;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建构是美国少数族裔儿童文学的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由于不同族裔本身的文化背景以及在美国的历史境遇不同,这些作品对文化身份的建构在意识形态、文化及其美学等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即便同样属于美国亚裔儿童文学,华裔作家和其他亚裔创作的儿童文学,也都流转着各自族裔“文化根系”的光影。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美国民权运动和之后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给予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以更多的写作自由和族裔文化信心。尤其是受到美国亚裔联合进行的“泛亚运动”(Pan-Asian Movement)的鼓舞,身份建构问题在日益兴起的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中得到凸显,无论是反映第一代移民史,还是讲述移民后裔的当代生活,都注重华裔儿童生存的文化空间营造及其引发的身份选择问题。有些作品倾向于表现华裔儿童如何迈向西方主流社会,而另一些作品更侧重于追索自身族裔文化,后者主要发生在以“唐人街”(Chinatown)为主要场所的小说中,或可说,“唐人街”这一地理空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族裔身份“孵化器”的作用,但在此“孵化”过程中,有时存在纷乱的矛盾与挣扎。这类唐人街童年叙事带有不同程度的寻根意味和不同性质的成长方向,因此需要细致区分和明辨。此外,这些作品虽然以唐人街为主要文化空间,但其聚焦的文化身份建构问题有着超越族裔的更为普遍的启示意义。本文将结合空间理论、流散理论和文化身份理论进行具体阐释和评价。

一、夹缝地带:并举、倚重与破壁

对于流散族裔而言,寻根的一条捷径是进入族裔文化社群——这一可能的文化和精神家园,流

谈凤霞,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19JZDD03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的阶段性成果。

散族裔的文化之根在因其聚居而成的社群空间中保留得相对充分,但它也会因遭外围文化的入侵而变得驳杂。段义孚(Yi-Fu Tuan)在其文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1977)中,区分了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的性质:“地方代表安全,空间代表自由:我们依附于其中一个(地方),而向往另一个(空间)……当我们思考它们时,它们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意义,并提出我们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①对于美国华裔作家而言,唐人街无疑是最具族裔特色的、最值得反复寻访的地方和空间。唐人街处于西方社会之中,准确地说,是位于西方政治和经济社会的边缘。亨利·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是活动的产物,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与技术领域,空间也是政治的产物。^②唐人街是19世纪80年代排华浪潮的“产物”,而唐人街“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部分是因为与当时盛行的种族意识形态密不可分,部分也是因为华人努力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③唐人街成为华人以群体力量对抗白人主流社会的一种“庇护所”,但从一开始就并非是完全封闭的一座“孤岛”。较早研究唐人街的中国学者吴景超在1928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中指出:华人移民及其子女一方面要消化吸收新的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背着从旧世界带来的文化包袱,“他或迟或早会转变成为一个边际人(marginal man),一个在主观上融合了两种文化的具有新的特征的人。当相互对立的观念和习俗碰在一起时,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④边际人的形成,是因为置身于中西异质文化对立或碰撞的“夹缝地带”。

作为华人移民及其后代生活的“流散空间”,唐人街是历史与现在的叠合,是原乡与他乡的拼贴与交杂。加布列尔·谢弗(Gabriel Sheffer)认为流散是一种处于“母土”和“归属地”两个地域之间的三元关系,是错置的集体性的“民族-国家”主体(ethno-national subject)^⑤,容易导致身份的游移。华裔笔下的唐人街被投注了华裔的情感和身份诉求,这一空间内涵不是既定不变的。关于“边际人”的身份书写,在20世纪以来的美国唐人街童年叙事中有不同的取向,这里以不同时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例,主要包括林语堂的《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 1948)、赵健秀(Frank Chin)的《唐老亚》(*Donald Duk*, 1991)、叶祥添(Laurence Yep)的《猫头鹰之子》(*Child of the Owl*, 1977)及其姊妹篇《偷心贼》(*Thief of Hearts*, 1995)等。前二者虽然并非专为儿童读者写作,但在客观上表现华裔儿童在唐人街的成长;叶祥添是当代美国华裔儿童文学创作界的杰出代表,他的这两部以唐人街为主要故事空间的作品包含尤为复杂的文化间性,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儿童文学和多元文化阅读的重要文本。

华人移民儿童在唐人街的成长叙事较早出现在1936年移居美国的林语堂笔下,他用英语写作的《唐人街》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纽约唐人街,以移民到美国的华人男孩汤姆的成长为线索,展示先后以开洗衣店和饭店谋生的华人移民家庭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而在唐人街立足的经历。洗衣店和中餐馆是唐人街底层服务行业人员的生存空间、商业空间和文化空间,是充分反映吃苦耐劳的中华传统精神的劳作场所,也是底层华裔儿童的生活空间和耳濡目染族裔品质的成长空间,因此成为华裔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叙事空间。根据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理论,对文学现象的解读必须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之中,因为文学场受到权力场的角斗和文化资本运作的影响。他认为研究文学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建筑群”,除了要考

① Y.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3.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6页。

③ 王保华、陈志明:《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张倍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

④ 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筑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8—309页。

⑤ G. Sheffer, “Preface”, in G. Sheffer (ed.),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p. 1-16.

虑文学作品、作者和读者因素,还需关注赞助商、出版人、审查机构等行动者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英语为美国读者写作的林语堂创作《唐人街》是接受了出版商的建议——以小说来指导美国人了解生活于美国的华人世界,因此其创作目的是展现华人如何在属于自己的生存地带、也是两种文化的夹缝地带自食其力地开创生活家园。初来乍到的林语堂对美国唐人街文化景观进行了富有温度的体察,其笔下的华埠人家是具备“温、良、恭、俭、让”传统道德规范的生活空间,同时他们又以入乡随俗的方式,接纳所居国的同样教人向善的某些异族文化。大卫·帕拉姆博·刘(David Palumbo-Liu)注意到林语堂笔下的这些华裔移民具有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特征,这“提醒美国人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抛弃的传统价值观”。^②此外,男孩汤姆对中西方两种语言的双管齐下,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并举主张。汤姆勤奋学习英语,并凭借对语言的敏感帮助美国老师重新发现英语的魅力,找到掌握英语的巧妙途径;另一方面,远离中国的汤姆也对中文国语和书法满怀兴趣和学习的热爱。他掌握的广东话和英文能使他在唐人街内外自由交流,中英语言给他带来身份的自由切换且边界清晰。汤姆在唐人街主要接受中国文化的哺育,相对安稳融洽的唐人街生活赋予汤姆成长的平和感和稳定性。即便他入美国学校已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西方文化圈,但其华人身份并未遭到白人攻击或发生与主流文化同化的质变,因此他对自己的族裔根基没有产生质疑和动摇。对于汤姆的这一文化处境和态度的处理,体现的是林语堂所持有的中西文化和谐共处和兼容并包的理想主义。美国在1943年终于废除了从1882年开始的长达六十多年的《排华法案》,一定程度缓解了白人主流社会与华人社会的对立,这一政治语境也为这部讲述纽约华埠人家的故事提供了温和的时代色彩。

第一代移民因为深知自己的来处而对族裔身份有清晰的认知,但是作为出生和成长于美国的华裔后代“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他们对“我是谁”的认知就更多了些作为“边缘人”的困惑。从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的《言语之重:亚裔美国作家对话录》(*Words Matter: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2000)中可以看到,许多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作家都流露出对家园和文化根源的迷惘。^③赵健秀和叶祥添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在童年时期经历了种族主义带来的身份困扰,成年后在童年叙事作品中自觉地进行族裔寻根。赵健秀曾以短篇小说《献祭》(*Food for All His Dead*, 1962)与戏剧《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反映华裔对唐人街的批判和背离,而以儿童为主角的《唐老亚》则一反成人文学中的激进表达,转而表现从背离到回归的选择。这部小说以旧金山唐人街的春节为故事背景,12岁的华裔男孩唐纳德·杜(被戏称为“唐老亚”)对自己华裔身份的颠覆性认知就在此时发生。唐老亚在美国白人学校接受的西方教育使他崇拜白人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低级无聊。地方命名会对身份或形象的体认产生某种暗示,19世纪末出现的“唐人街”一词通常语带贬义,反映出西方对异域东方的猎奇心态以及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不仅是对唐人街意识形态有话语权的欧洲人,连华人也接受了这种标签的合法性和权力关系。”^④小唐老亚被西方白人文化所同化,戴上了“东方主义视镜”,一心想要摆脱唐人街的身份烙印,但另一方面又遭到白人社会的排斥。小唐老亚的改变得益于他回唐人街过中国新年时的神秘梦境,他穿越到19世纪中期华裔劳工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历史中,见证了华工的勤劳、智慧和英雄主义气概,但他们的杰出贡献却被白人社会所抹杀。梦醒后的唐老亚与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的白人好友一起寻找证据,认识到历史上华裔的壮举,从而抛弃了之前被白人社会同化的种族主义思想,勇敢地

①参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82—583页。

②D. Palumbo-Liu,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6.

③参见 K. Cheung (ed.), *Words Matter: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④王保华、陈志明:《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第31页。

站出来反驳白人老师对华工形象的污蔑。对于唐人街保留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唐老亚起初反感,抗拒父亲把他送去学习舞龙,但在当他领会了族裔历史和精神后,则自豪地加入春节庆典中的舞龙队伍,标志他完成了从对唐人街的鄙弃到认同的思想蜕变。“写作即战斗”是赵健秀的一贯宗旨,《唐老亚》以唐人街为文化阵地,立足于历史维度,召唤被华裔移民后代遗忘的坚忍不拔的母族文化精神。他凭借对唐人街依然保留的族裔文化之根的倚重,来对抗西方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甚至“被消声”的命运。

唐人街也是叶祥添频频光顾的写作空间,他以此为“据点”写作了一系列以历史、现实、侦探为题材的儿童小说,展现几代美国华裔的生存状态。唐人街童年既是他重要的写作资源,又孕育了他不乏矛盾的文化情结。“我是在黑人社区长大的华裔美国人,因为太美国化了,无法融入唐人街;也因为太中国化了,无法融入其他地方。”“我不仅感觉不充分,而且不完整——就像丢失了几块关键部分的拼图。”^①这种“不完整感”与夹缝地带的边际性有关,他意识到自己是中美两种文化的“双重局外人”,这构成其小说独到的文化视角和主题。从创作时间角度看,《猫头鹰之子》和《偷心贼》前后相隔约二十年,但两部作品的主要角色之间却具有代际相承关系:前一部中的女孩凯西和外婆,分别是后一部中的斯黛西母亲和太婆。生活在唐人街以外的两代少女起初都没有在意自己的族裔,直至进入旧金山唐人街后遭遇文化冲击才产生了错愕感。《偷心贼》还涉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合法化的跨族混合婚姻,斯黛西是华裔母亲和白人父亲的爱情结晶,因而增加了混血儿身份认同的新问题。叶祥添从美国化的华裔少女视角来挖掘这一文化夹缝地带中继续繁衍或发生变异的族裔特质,生发对双重文化身份的审视。她们首先遭遇的是关于身体肤色的冲击,“肤色”提醒其“种族身份”,让她们感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身体中醒来了”^②。第二重冲击由语言引发,凯西和斯黛西都因为不通中文而感觉到了被排斥。“语言是文化、民族感的媒介……通过把共同经历组织编码成象征符号将人们团结为一个整体。阻碍语言就割裂了文化与感性。”^③她们初入唐人街时,觉得“永远都无法逾越那些围绕在唐人街周围的看不见的墙”^④,而在跟随外婆或太婆对唐人街进行由表及里的探访后,逐渐发现了唐人街生活和人际的种种可亲可爱之处,意识到唐人街是第一个让她们“生根”的地方^⑤。她们对族裔文化之根的认同并不是出于完全理性的文化自信,而是情感上的文化亲近,其身份意识经历了一个转化过程:从之前的隔阂与错置,到之后的“破壁”和渗透,体现了叶祥添所秉持的共存互补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文化身份的建构与空间场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列斐伏尔辩证地指出社会空间之间会“相互渗透和/或互相叠加”^⑥,多种社会关系之间可能相互间夹、相互结合或相互冲突。美国华裔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政策,常处于与主流文化权力的斗争与协商之中,因此更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上述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同化政策,试图为唐人街保留的中国文化争得权利。唐人街地带是典型的流散族裔生存空间,文化理论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流散者至少具备一种身份,他们学会在文化之间协商和翻译,由于他们是几种历史和文化相交织的产物,他们又懂得与差异共存,懂得从差异中寻求发声的机会。^⑦ 唐

①L. Yep, *The Lost Garden*, New York: Beech Tree Books, 1996, p. 12.

②L. Yep, *Child of the Ow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 27.

③F. Chin & J. P. Chan, “Racist Love”, in R. Kostelantz (ed.), *Seeing Through Shuc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p. 77.

④L. Yep, *Child of the Owl*, p. 54.

⑤L. Yep, *Child of the Owl*, p. 195.

⑥[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 129 页。

⑦S. Hall, “New Cultures for Old?”, in T. S. Oakes & P. L. Price (eds.), *The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64 – 274.

人街童年叙事为这些差异提供了儿童的发声场域,小说中的唐人街承载了华裔族群的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存在内部人文环境的裂变,成为华裔后代儿童或留守、或叛逃、或回归、或借力的精神原乡。

二、代际关系:承袭、回归与弥合

从身份位置而言,上述小说中初入或重回唐人街的华人儿童发生了身份的位移,其身份建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情绪和认知的震荡,而促使其走向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华人家庭这一代际空间中的正向力量。家庭代际关系既是空间,也是一种时间的体现,个中常有矛盾甚至分裂,也有通过有效沟通达到的理解和缝合。这些形成了代际关系这一隐形空间的张力,对于儿童的文化身份认知产生不同方向的牵制或引领。

家庭空间是孩子成长中举足轻重的小环境,代际关系则往往与伦理文化相关。在美国华裔家庭中,上一辈的文化态度对下一代的影响存在吸引或拒斥两种可能。林语堂和赵健秀的小说主要写父子两代或兄弟关系,而叶祥添的两部小说则聚焦于祖孙关系。长者形象往往代表族裔文化保存者,直接或间接引领后代成长,但不同作家赋予长者角色的功能和意义有别。在林语堂的《唐人街》中,20世纪初在唐人街开洗衣店的冯家延续了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的中国传统伦理。冯老爹始终保持着中国人善良踏实、克勤克俭的作风,他希望儿女即便到了美国,也能遵从中国孔子代表的道德教义。他处事公平,在家中具有威信,备受儿女们爱戴。冯老爹夫妇对待意大利裔儿媳疼爱有加并接受她的宗教信仰,他们虽然文化不高,但思想开明。汤姆的大哥是孝敬父母、维护家庭整体的模范长子,任劳任怨地帮着父亲辛苦经营洗衣店,连意大利裔的妻子也受其影响而融入了中国传统家庭。有所叛离的是接受了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二哥,他和保守的父亲与大哥之间在行为处事方面有分歧。他从事保险推销,广泛结交白人,更重视金钱、名誉和享乐,但本质上存有良善和正义。汤姆深受父亲和大哥所代表的朴实敦厚的中国作风的影响,而对美国化的投机取巧的二哥所代表的文化取向保持怀疑。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汤姆全家都积极地参与唐人街华人组织的抗战游行,慷慨捐出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尤为让他们扬眉吐气的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使得美国白人对华人开始刮目相看。^①汤姆目睹了父母和大哥安分守己、勤劳苦干的奋斗历程及其深明大义的行动,感受到以父亲为代表的海外华工对自身民族的热爱以及身为中国人的骨气,因此,在汤姆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他的身份建构主要是继承自身家庭较为鲜明的国族文化认同。这个家庭代际之间总体奉行的是相互尊重、和睦谦让原则,这也使得汤姆在家庭内外的身份问题处理上趋于平顺和谐。

文化身份的冲撞主要发生在具有“ABC”身份的代别身上,他们受到唐人街外部文化影响而对固守内部文化的父辈产生抗拒。“亚裔美国人身份的不确定性不只来自外部的他者凝视,更来自亚裔美国人的自我定位,来自他们对自身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犹豫不决,其中无不体现出一种流散者摇摆不定的身份迷惘与低人一等的种族忧伤。”^②赵健秀的《唐老亚》中,唐老亚父子之间的矛盾主要来自子一代对父辈华人身份的贬低和拒斥,因为他将白人社会对边缘族裔的敌视态度内化而

^①小说多次强调冯老爹因为被美国人尊重而感到喜悦。美国人看到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华人形象,而不是美国本土之前宣传的“黄祸论”和部分电影中歪曲塑造的如包括凶恶奸诈的傅满洲、低眉顺眼的陈查理在内的刻板式华人形象。事实上,林语堂塑造的品德高尚、有追求有担当的冯家人也同样更新了唐人街华人形象谱系,构建的是值得美国主流社会尊重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

^②蒲若茜等:《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范式与理论关键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28页。

产生了“种族自我憎恨”，赵健秀犀利地指出：“作为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工具，主体为了能有效运作，他必须接受并生活在一种美名化的自我贬抑状态之中。”^①小唐老亚认为自己出生于美国就是美国人，他和父亲之间存在冲突。唐老亚父亲拥有被华人社区公认为最正宗的中餐馆，他思想理性、性格成熟，教导儿子要了解族裔的历史：“历史是战争，不是游乐。你要维护好自己的历史，不然就会丢失。”^②当儿子抱怨周围的霸凌时，他严厉地指出儿子的问题在于“走起路来像个悲伤的弱者”，不准他自怜自艾。唐老亚的伯伯是巡回演出的粤剧演员，他也把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感情和见识传递给无知的唐老亚，点燃他对族裔文化的热情。在父辈身体力行的教导下，小唐老亚开始认识自身民族的精神底蕴，并向挺直腰杆的父辈们看齐。

叶祥添的小说涉及多重代际矛盾，父母形象虽是次要角色，但却指向一代美国华裔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倾向。《猫头鹰之子》中，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强势文化的压迫或引诱下，凯西的父亲巴尼和舅舅菲尔走向了被动或主动地“美国化”道路，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推崇的金钱观胜过了中国伦理社会重视的亲情。凯西对父辈面目的认识和鄙弃，表明她和美国化的父辈的分歧甚至决裂。凯西从外婆那里得知了早逝的妈妈对于“中国性”（Chineseness）的接受，她跟妈妈有所趋同，但又不完全一样：她既不背离中国族裔的文化身份，同时又追求“做自己”的权利。《偷心贼》中父母的文化态度更为健全，斯黛西在了解妈妈凯西童年时期在唐人街也曾有过的孤独和挣扎后，和妈妈产生了共鸣，而妈妈对华裔身份的自重也给了斯黛西接受华裔身份的信心。她的白人爸爸对中国文化满怀热爱、对以太婆为代表的中国人很是亲近，她看到了爸爸内心有着包含了正义、开放和平等的“坚硬的核”，这也推动她接受中西文化的交融。

在《猫头鹰之子》和《偷心贼》中，真正对年少一代的族裔身份认知乃至思想、性格和人格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保留了更多中国性的婆婆，“老一辈”成为照亮孙辈生活之路的“灯塔”。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西方华裔成人文学中所建构的“母性谱系”的扩容，华裔女作家在成人文学中选择从剑拔弩张的母女关系入手，让女儿们对母亲代表的身份和传统文化进行认同或反思，汲取与现实抗争的力量。而叶祥添的少年小说则重“祖孙关系”，这是一种无关性别、更为温和的儿童文学寻根之道，塑造情感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外祖母形象。在凯西和斯黛西的眼中，会中文和英文的外婆/太婆从容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凯西外婆在家里焚香、供菩萨、收听中国节目等的生活方式，表明她对中华民族之根的坚守；另一方面，她自尊而独立、不固守自己族裔文化的壁垒，这尤其反映在她对待不肯支付她医疗费儿子以及偷盗她宝玉的女婿的宽容态度上。她体谅他们在文化夹缝中的可怜处境，也辩证地意识到中国传统的东西并不都完美，而老中国只存在于老一代华人的生活和电影中。她给凯西的劝导含有对族裔文化和美德失落的无奈，但更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清醒。在《偷心贼》中，太婆一如既往地以开放的世界观给身份迷失的混血儿斯黛西以重要的引领。

两部小说的结尾都写到了女孩和婆婆的亲密拥抱，这一身体的亲密接触意味着跨越文化的代际联通。婆婆身上汇聚了东方地母般的宽宏慈爱和西方女性的独立自强，女孩们从这位祖辈身上发现其坚强与博大的内心，发现其“根”之所在：不仅是文化之根，也是精神之根和心灵之根，“她的根似乎一直延伸到地球的核心之骨”。凯西诉说：“婆婆，我希望在我长大后，也成为像你一样的人。”^③这一宣言表明了华裔后代对老一代保留的中国文化精髓的呼应，但要细辨的是，这一“根”或“核心之骨”并非是单一的中国特质，而是融入了部分可取的美国特质。婆婆始终反对心胸狭隘，其文化胸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婆婆所代表的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老一代，而是迁徙至

^①F. Chin & J. P. Chan, “Racist Love”, p. 67.

^②F. Chin, *Donald Duk*,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91, p. 123.

^③L. Yep, *Child of the Owl*, p. 205.

西方新土并顽强生长的美国华人:既保留自己故土民族的精华,同时也汲取新土国家的精神特质,融合成为“自足”的文化主体。婆婆的形象集中体现了成功跨越种族和代际鸿沟时的重要品质,她通达、无私、富有牺牲精神,有一颗自尊自强、持续开放的心灵。婆婆和年幼一代分享属于族裔与个体的人生经验和洞见,帮助他们纠正偏见和消除误解,完成了族裔文化和代际智慧的传递。可以作一比较的是,在以“非唐人街”为背景的华裔儿童小说中,作为老一辈华裔移民代表的祖母形象也是孩子们常去“光顾”和“感觉”族裔身份的重要文化介质和对象,蕾切尔·恩多(Rachel Endo)在评论丽莎·易(Lisa Yee)创作的《天才女孩闵》等华裔儿童小说时曾指出:“丽莎·易通过美国华裔家庭的主题——尤其是通过华裔祖母,来表现族裔文化的连续性,意味着儿童主人公对归属感和地方感的一种无意识的渴望,这种归属感植根于对华人身份的抽象观念。”^①然而,在诸如此类的作品中,并不生活于唐人街的祖母形象更多是点缀式的边缘文化符号,而叶祥添笔下富有质感的唐人街老祖母,则被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心之所向的完美文化坐标,切切实实地影响孙辈的文化身份建构。

值得关注的一个代际文化细节是孩子的姓名问题,孩子对于中英文姓名的接受或排斥代表其身份取向。林语堂的《唐人街》中,中国男孩汤姆在移民美国前,父亲就给他准备了这个美国式名字,让他更便捷地进入西方文化,成为一个被美国人接受的人,而不是用中国名字凸显外来者身份。形成对比的是,赵健秀和叶祥添笔下的小主人公则溯源其中华姓名。小唐老亚讨厌他的英文姓名 Donald Duk,因其发音和迪士尼卡通形象唐老鸭(Donald Duck)相近而被同学取笑。这个名字也有政治意味,作者设置这个与美国动画形象“唐老鸭”相近的姓名,意在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压迫。^②受美国文化同化的小唐老亚起初想用他崇拜的美国舞蹈家的名字为自己定位,以此来获得某种身份“尊严”,但并不奏效。促使他在精神上开始“站起来”的,是他真正的中文姓氏:他后来从父辈那里得知自己本不姓杜,而与《水浒传》里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同姓“李”,这一水浒英雄的姓氏给他注入了来自族裔的英雄气概,让他体认到了相连的精神血脉。《猫头鹰之子》中,当凯西得知外婆给她取的中文名是“春味”后,兴奋地念诵自己的中文名字:“我的第一个名字。我事实上的名字。我的真正的名字。”^③艾伦·佩斯·尼尔森和唐·尼尔森(Alleen Pace Nilsen & Don L. F. Nilsen)在《少年文学中的姓名与命名》(*Names and Naming in Young Adult Literature*)一书中指出,少年人将名字看作是他们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中观察到的根源,少年人比成年人更喜欢操纵和呈现他们的名字。”^④“人们选择名字是为了纪念,或者至少是暗示民族身份。”^⑤的确,命名包含着国族、时代、文化元素以及命名者的态度、意愿、希望等,具有族裔色彩的名字是族裔文化谱系的一份“遗产”。华裔孩子对于上一辈取的中文姓名的悦纳,标志着子一代对华裔身份根系的肯定、认同和传承。对中国“名字”的揭秘往往是儿童成长环节的一个小高潮甚至小圆满,这也可在卡洛莱·马斯登(Carolyn Marsden)和弗吉尼亚·欣美·罗(Virginia Shin-Mui Loh)的儿童小说《玉龙》(*The Jade Dragon*, 2006)中得以佐证。中国名字是促成两个闹矛盾的华裔女孩重归于好的“强力胶”,当她们知道了彼此的中国名字并用来呼唤对方时就开始化干戈为玉帛,对族裔文化身份的一致

① R. Endo, “Complicating Culture and Difference: Situating Asian American Youth Identities in Lisa Yee’s *Millicent Min, Girl Genius* and *Stanford Wong Flunks Big-Tim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Vol. 40, No. 3, 2009, pp. 235 – 249.

② 这一主题与智利作家多夫曼和阿尔芒写作、后以英语版流传世界的论著《如何阅读唐老鸭》的主题相关,此书批评了美国迪斯尼通过唐老鸭卡通形象作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对第三世界儿童灌输美式拜金、竞争、享乐的价值观念和塑造“自我殖民”的弱智心灵状态等问题。

③ L. Yep, *Child of the Owl*, p. 143.

④ A. P. Nilsen & D. L. F. Nilsen, *Names and Naming i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7, p. ix.

⑤ A. P. Nilsen & D. L. F. Nilsen, *Names and Naming i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p. xiv.

认同助长其“同根”友谊,让她们找到族裔文化的共同归属并团结一体。美国学者于连·沃尔夫莱(Julia Wolfreys)在论述“身份”这一关键词时提到“身份叙事的出现需要独特身份的记号和踪迹的某些重复”,^①的确,姓名与肤色一样,正是华裔儿童文学叙事中常会出现的重要的身份“记号”,不断强化儿童主人公对于族裔文化身份的拥抱意识。

三、故事隐喻:传道、形塑与杂糅

通过追溯族裔的文化本源来肯定并建构各自族群文化的特殊性,是华裔作家寻根的方式和目的,除了进入现实中的地理空间和家庭内部的代际空间之外,他们还常选择一种抽象的文化空间——自身族裔特有的文化资源和民间传说等,尤其是通过“讲故事”来进行文化身份的播种。故事是一种能唤起代入感和共情的空间,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认为共情由两种认知性的能力和两种情感性的能力组成:“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的认知能力;准确识别和区分他人情感的认知能力;理解他人情感状态的情感能力;亲身体验过一些情感、能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或能产生一致的情感反应的这类情感能力。”^②蕴含强烈的感情并承载了族裔隐喻的文化故事,可以为听故事的儿童提供潜移默化的身份建构空间,因为“讲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融合和情感融合的行为。它暗示了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通过故事将听者与他的族裔文化遗产相交织”。^③要注意的是,族裔故事构成的“文化风景”,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力量悄然改变看风景的“眼睛”。

采用道听途说的民间故事是不少美国华裔移民后代作家惯用的策略,来自中国的林语堂虽然熟谙地道的中国传统故事,但他在《唐人街》这部小说的文化元素处理中,更重视的是大一统的中国哲学文化,而不是大张旗鼓或添油加醋地讲述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只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中出现,冯家过中秋节时,冯太太应小女儿央求而重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在冯太太口中,嫦娥是因后羿追逐而逃到月亮上,最后只能孤独地在月亮上想念地上心爱的人。这一反映羞涩矜持的东方女性的故事版本,无意中对应对了来自上海的少女艾丝进入美国后仍然保留的传统心理和思维,她在爱情中自甘被动,之后才有所觉悟。这类故事只是小插曲,没有成为《唐人街》中扣人心弦的情节线索或主旨隐喻,因为作者真正醉心去表现的是具有中国哲学底蕴、值得向美国“兜售”的优质文化景观。林语堂在移居美国前,就用英语写作了面向美国大众的散文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这是他在美国的成名作,定居美国后他继续用英语写作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作品,旨在让西方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同时也提醒华裔后代不要忘记悠久的民族文化之脉。写作《唐人街》这部小说时,适逢他对道家思想十分倾心,与《唐人街》同年出版了《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 1948),其小说中也融入了具有中国道家哲学意味的内容。来自中国的艾丝对道家思想的褒扬和阐释,吸引了因远离中国本土而对古典文化缺乏积淀的少年汤姆。汤姆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接触和欣赏,使他能以族裔文化编织的这一身份羽翼来保持在西方社会文化气浪中飞翔的平衡。他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充满浪漫幻想和力量的诗歌,也喜欢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和庄子超凡脱俗的智慧。他对中西文化精华兼收并蓄,在交汇融通之中建构出更加开放和饱满的文化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相比

①[美]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②J. Stephens, “Affective strategies, emotion schemas, and empathic endings: Selkie girls and a critical Odyssey”, *Papers: Explorations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 23, No. 1, 2015, pp. 17-33.

③R. Natov, “Living in two cultures: Bette Bao Lord's stories of Chinese-American experience”,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Vol. 11, No. 1, 1987, pp. 38-46.

同一时期其他华裔作家的唐人街叙事展览——如华裔作家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自传《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流露了第二代华裔移民对白人主流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文化臣属或归化渴望而言,林语堂的《唐人街》中的少年汤姆所建构的文化身份中,带有不卑不亢的文化人格、笃实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自成一家的文化气质。

比起林语堂中正平和的传道,赵健秀在《唐老亚》中转引的故事则更具有阳刚之气,志在凸显族裔精神之威武。贝拉·亚当斯(Bella Adams)指出,少数族裔文学的文化民族主义通常侧重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议题:抵抗沉默、质疑刻板形象和修改文化历史与身份。^① 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批判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和表现中国民间故事,是赵健秀作品的一贯主题。作为“哎-咿集团”的核心成员,他批评一些亚裔作家伪造亚裔美国历史和亚洲文化,认为他们笔下的亚裔美国历史和文学塑造了迎合主流社会的“新版本”的亚裔刻板形象,^②他坚持以具有“真确性”的中国文学文本来另辟蹊径,以此实现破解那类形象的创作意图。《唐老亚》选取《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水浒传》中的李逵等英雄的故事来帮助“形塑”华裔儿童文化身份。赵健秀有着浓厚的“关羽情结”,他以小唐老亚的梦境方式,巧妙地将骁勇善战的名将关公形象,移用进19世纪华工参与建造中太铁路的历史中,将故事中的关姓大汉设置为带领华工克服艰难困苦、完成筑路工程的英明领袖。关公故事的化用既凸出了母族的精神气概,也彰显了美国华裔在筑路历史上的奋斗精神,令小唐老亚为之振奋和激荡。赵健秀选用的民间文化元素张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元气,以给历史去蔽的方式来凸显美国华裔在美国铁路建造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哎-咿集团”力图关注与展现的始终是亚裔群体的本土经历和合理合法的本土身份,其中隐藏着一个“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置换”。^③《唐老亚》以关公故事来重建北美华裔的英雄主义历史,使之润物无声地进入华裔后代的文化意识并延续自身族裔敢于抗争的精神血统。这一关公故事从梦境到现实的频繁插入和变体呈现,为小说叙事增加了具体可感且有弹性的文化血肉,也日益成为刻写在华裔儿童主人公身上的一道精神印记和令他引以为豪的身份标志。

民间故事往往包含隐喻,而“讲故事”具有重要的改造力量。段义孚在研究人文地理时也关注了故事这一文化载体,他认为:“一个好的故事富含隐喻,具体细节不真实,却符合人类经验与条件……所有广为流传的故事——真实的抑或虚构的——都有改变观念的力量,以至于任何‘存在’(现实)不再完全一样了。”^④叶祥添十分擅长在小说创作中挪用中国民间故事和传说,在之前的《龙翼》(*Dragonwings*, 1975)等“金山系列”历史题材小说中就已使用这一写作策略。《猫头鹰之子》和《偷心贼》中涉及的中国民间故事颇为复杂,老一代给少一代所讲故事名称即是小说的题目,由此可见,这些小故事便是整部作品核心化的隐喻载体,猫头鹰和偷心贼的两个故事传达了身份错置带来的漂泊感、孤独感和失落感。故事作为祖孙两代进行沟通的介质,以其神秘性吸引孩子去倾听和感受。婆婆是见多识广的早期移民,十分理解身为移民在遭遇“文化失根”时的心灵窘困。她通过讲述虚构故事这一委婉的方式,让年少一代释放由于身份迷失而产生的惶惑与迷思,并启示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孩子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通过对故事角色的对号入座、对角色情感的感知共鸣和对悲剧成因的认识反思,摸索自我身份的建构之道,同时发现并预知那些应该规避的风险。

①B. Adams,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3 - 74.

②F. Chin,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in J. P. Chan (ed.),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eridian, 1991, pp. 1 - 93.

③赵文书:《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④[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宋秀葵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149页。

叶祥添认为中国民间故事表达寂寞、愤怒、恐惧,同时提供爱、安慰和希望,与之类似的复杂情感恰恰也是美国华裔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多部小说中挪用具有传奇性的故事、纳入变形的民间故事,为的就是形象地表现难以直接言明的唐人街“心灵状态”：“与其说唐人街是一个地方,不如说它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心灵状态——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我尽可能多地向自己和他人解释。然而,心灵是一个很难进入的地方,更不用说去描述了,除非你带着某种伪装。”^①因此,他借助“伪装”过的故事来描绘唐人街心灵,猫头鹰和偷心贼故事都不再是原汁原味的民间传承,而是作者中西杂糅的个人重造。叶祥添意识到自己作为“丢失了一块拼图”的“边际人”的身份缺失,而其创作就是进行“拼图”的过程:“我可以把手伸进我灵魂所在的破布盒里,把它们缝在一起……我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每一种元素都属于另一种东西,并把它们浸入我的想象中,在那里它们被融化并铸造成新的形状,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我独一无二的东西。”^②他在叙事中混杂不同文化,带来思想和艺术上的弹性和张力,中西元素经过改写、杂糅进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景观。例如,猫头鹰茉莉的婚恋故事与中国的牛郎织女故事具有相似之处,而茉莉的去留选择则类似于西方的海豹女故事,追求的是遵从生命欲求、注重个体自我的价值观,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要注意的是,这种经过想象、涉及族裔文化的拼图,有时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中西故事的杂糅可以跳出叙事的窠臼,创造出服膺于主题的新颖图案;另一方面,中西故事的杂糅也可能带来价值的模糊、混沌乃至混乱,甚至不自觉地带入了东方主义视点,沦为供西方观瞻和消费的猎奇性景观。

欧文·塞米尔·史克(Irvin Cemil Schick)认为:“身份是其自身的建构……而叙事是使这种建构得以实现的媒介。但身份的建构与他性的建构是不可分的——实际上,身份本身只有与他性相并置才具有意义”。^③身处“夹缝地带”既是一种局限,同时也具有跨种族、跨文化的流散身份的居间优势,作家可以适当采用“自性”和“他性”来打破旧质、创造新质。这种中西元素搭配杂糅的故事往往存在“文化间性”,有着自我视域与他者视域的融合,显示异质文化之间以不同文化态势进行的关联和互动,如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所言,展示“故事、梦、想象、意识、潜意识”如何“混合、溶化、流动”。^④这些族裔文本在跨文化旅行中进行重新编码,构建不同于原来的“此”与“彼”的“第三空间”。^⑤与少年主人公现实成长经验相交织的民间故事文本的加入,强化了互文和隐喻功能,增强了艺术空间的张力。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故事往往有作为意识形态的事件、象征或隐喻的主题,为不同文化的差异共存提供了某种相互丰富的方式。在故事空间的养育之中,原本为“双重局外人”身份所困的孩子破茧而出,寻找到“协调”之路,重构文化身份空间,这可用斯黛西太婆所说的“间际(in-between)”一词来概括,通过在二元之间进行的各取其长的品鉴与糅合,达到“既此又彼”的身份平衡和主体自洽,即以积极弥合的“间际性”(in-betweenness)^⑥解决了“夹缝地带”的文化身份困境。

①L. Yep, *Child of the Owl*, p. 216.

②L. Yep, *The Lost Garden*, p. 91.

③I. C. Schick, *The Erotic Margin: Sexuality and Spatiality in Alteritist Discourse*. London: Verso, 1999, p. 21.

④单德兴:《“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⑤J. Stephens, “Advocating multiculturalism: Migrants in Austral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fter 1972”,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Vol. 15, No. 4, 1990, pp. 180–185.

⑥林英敏(Amy Ling)提出了华裔美国女作家的族裔与文化身份“间际性”(in-betweenness)的自觉意识,参见:A.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p. 20.

四、结 语

上文从地理、代际和故事这三个维度阐释多重文化空间中的唐人街童年叙事样貌,探索其建构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不同立场、途径和效果。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作为属于同一族群的集体身份虽具有稳定性,但更具有建构性与动态性,处于“此在”(being)和“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文化身份远不是永恒地定格在某种被本质化的过去,而是从属于历史、文化和权利永恒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文化身份也不是对过去的‘复原’,不是等待着被发现,或者发现之后就使我们获得身份的安全感,而是我们在对于过去的叙述中被定位或定位自己的不同方式。”^①这些面向西方社会的唐人街童年叙事,从儿童视角出发,对族裔文化根系进行发掘、发扬甚至重构性的“发明”,扮演了一种文化转译者和重塑者的角色,在西方社会中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品格的魅力。王宁在评价美国华裔成人文学功绩时指出:他们通过这种“本土全球化”式的写作,把一些(本土化的)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强行加入(全球性的)英语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②华裔儿童文学的价值时常被学界忽略,实际上,它们同样有着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研究中指出,地方和社群会产生强烈的“共同体自我意识”和“我们与他们”的心态,从而导致冲突。^③在后殖民文化蔓延的当今时代,这种意识和冲突日益加剧。本文讨论的华裔儿童在唐人街这一族群空间中的寻根故事,使先前被淹没的华裔儿童的声音被听见、经历被体验、思想被呈现,他们在与异质力量的交汇或交锋中顽强地寻找可行的文化“合作”或“合成”之道,从小就去积极建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故事的结局中投射了温情主义和理想主义光影。这些书写对弱势族裔的儿童乃至整个族群的身份建构都富有启示意义,其核心乃是关于如何建立边缘与主流文化之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适度关系,建立充分的族裔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碰撞中的主体自治。

此外,若跳出族裔文化这一背景来看,这些唐人街童年叙事的本质关涉成长母题,作家们深入探索华裔儿童在双重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建构和人格发展,揭示其来自社会大环境、家庭小环境和自身内部的种种困扰、挣扎和挑战。因此,小说讲述的儿童成长既是美国少数族裔在主流文化的边际空间建构安身立命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跨越成长门槛的考验中寻找自身位置、获得自我确认和思想力量的个人主体性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这些唐人街童年叙事具有超越族裔文化书写、更为普遍的成长意义。然而,不同于意在“搅乱宇宙”(disturbing the universe)^④的“反乌托邦”的美国少年文学的是,这些华裔作家都怀抱良好心愿去“协调宇宙”。从儿童文学的阅读接受效应而言,“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孩子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处的空间,以及他们了解和居住的方式,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他们的故事也帮助定位和塑造读他们故事的孩子。事实上,书中的人物和读者都生活在一个矛盾的地带:他们同时是定居者和原住民,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本地的和全球的,而且也许在这一刻正转变成另一种。”^⑤华裔作家的唐人街童年叙事构

^①S.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E. Braziel & A. Mannur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0, p. 236.

^②王宁:《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华裔流散写作及其价值》,《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③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第8页。

^④参见:R. S. Trites,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Power and Repression in Adolescent Literature*, Iow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0.

^⑤T. Doughty & D. Thompson, *Knowing Their Place? Identity and Spac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p. 4.

建了这样一种沟通性的“桥梁空间”，帮助身处不同文化空间的读者探索属于自身的成长方向和融合方式。

(责任编辑:邵泽斌)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n's Childhood Narration about Chinatown

TAN Fengxia

Abstract: The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core of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natown, as a social ethnic space,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as it works as an incubator of children's ethnic identity in literature. Childhood narration about Chinatown by Lin Yutang, Frank Chin, Laurence Yep and other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depict the interwoven problems in the in-between zon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a family and the metaphorical space of the story in different ways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They explore, develop, and even “invent” the ethnic cultural roots through reconstruction. Their works play a rol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or remodeling in the diaspora space, showing th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spirit, and character. Reflecting different standpoints, approaches, and purport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se works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marginal groups to establish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consistency of subjectivity in the cultural gap.

Keywords: Chinese American; Chinatown; childhood narration; roots; cultural identity

About the author: TAN Fengxia,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